

薛暮桥文集

第十一卷

薛暮桥文集

第十一卷

(1985)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铁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裴 刚

封面设计：吴锦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薛暮桥文集 (Xue Muqiao Wenji) / 薛暮桥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6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

I. ①薛…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9715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平阳装订厂

尺寸 155 毫米×235 毫米

印张 339

插页 2

字数 4718 千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0 元 (总二十卷)

ISBN 978 - 7 - 5049 - 5906 - 5/F. 546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目 录

近几年工业增长“计划低、实绩高”的原因 ——兼谈如何控制货币流通量问题 (1985 年 1 月)	1
关于物价的几个问题 (1985 年 1 月)	7
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1985 年 2 月)	15
新中国成立前后稳定物价的斗争 (1985 年 2 月)	18
培养更多的合格的统计人才 (1985 年 3 月)	33
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给杨波、季龙及轻工业部党组的信 (1985 年 3 月)	34
六十年代前期物价的稳定与调整 (1985 年 3 月)	35
在无锡市经济发展战略咨询会上的发言 (1985 年 4 月)	51
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 (1985 年 4 月)	57
《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前言 (1985 年 5 月)	64
《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绪论 ——我是怎样研究物价和货币问题的 (1985 年 5 月)	67

价值的计算和各类商品定价的基础	
(1985 年 5 月)	76
价格政策与货币制度	
(1985 年 5 月)	84
价格与国民收入的分配	
(1985 年 5 月)	93
价格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	
(1985 年 5 月)	100
怎样发展合作事业	
——《中国合作经济报》代发刊词	
(1985 年 5 月)	107
就江阴港口、船舶合作的问题给柴树藩、张有萱的信	
(1985 年 5 月)	110
一九七九年以来稳定和调整物价问题	
(1985 年 6 月)	112
苏南见闻杂记	
(1985 年 6 月)	135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前言	
(1985 年 8 月)	142
勤奋的学者 忠诚的战士	
——回忆钱俊瑞同志	
(1985 年 8 月)	146
发展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协作	
(1985 年 8 月)	153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开幕词	
(1985 年 9 月)	160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应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85 年 9 月)	163
在不平凡的革命道路上沉着前进	
——纪念陈翰笙同志任北京大学教授六十周年	
(1985 年 9 月)	172

同消费者谈谈物价问题	
——祝贺《中国消费者报》创刊	
(1985 年 10 月)	180
一定要把工业普查搞好	
(1985 年 10 月)	185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85 年 10 月)	189
我对《七五计划建议》的认识	
(1985 年 10 月)	192
发展和改进金融事业	
(1985 年 11 月)	196
经济模式还是复杂一点好	
(1985 年 12 月)	203
及时地正确地提供信息	
(1985 年 12 月)	207
我国六年来物价和人民生活的变化	
(1985 年 12 月)	209
谈谈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	
(1985 年 12 月)	215
物价的结构的调整和通货膨胀	
(1985 年 12 月)	222
回忆“皖南事变”前的北移	
(1985 年)	229

近几年工业增长 “计划低、实绩高”的原因*

——兼谈如何控制货币流通量问题

(1985 年 1 月)

会议开得很好，很及时，大家对当前经济形势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从 1979 年以来，我们主动降低工业生产的计划指标，执行的结果，工业生产增长幅度大大超过计划指标。近两年，这种增长趋势愈来愈明显。出现这种计划低、实绩高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今后应当怎样改进？这是赵紫阳总理最近提出来要我们讨论的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在四天讨论中，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这里我谈点个人的看法。

1956 年，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强调编制计划必须留有余地，但这条方针在 1957 年只执行了一年，就被“大跃进”冲掉了。调整时期，直到 1965 年比较重视这条方针，但接着出现的“文化大革命”又把计划工作根本打乱了。1970 年起积累率又年年超过 30%。随着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就不能不提出过高的工业生产指标，使计划不是留有余地，而是留有缺口，并且缺口愈来愈大，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 1978 年。

从 1979 年起，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方针，大力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主动降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计划指标，“保四争五”，但是执行结果，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8% 以上，近两年超过 10%（去年达到 14%）。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计划指标订得太低？如果太低，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呢？这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 这是作者 1985 年 1 月 7 日在九省市经济研究中心座谈会上的发言。

据我所知，前几年，在编制国家计划时，按“保四争五”的增长速度，也不是留的余地太大，而是仍有缺口的。而且执行结果，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大大突破国家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到1981年就不得不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使当年的生产增长速度随之下降，但供应情况好转，开始出现若干种产品的买方市场。从1982年起固定资产投资又年年突破计划，投资增长得快了一点，生产资料的供应又紧张起来。为着保证生产资料的供应，除计划分配外，开始实行议购议销制度。各部门、地区、企业为了争取更多的超产，以增加自销部分，往往对生产指标订得比较低。但实际执行结果，由于调整和改革工作逐步生效，生产增长速度节节上升。到1984年，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已经显著地超过国家计划，超计划的部分都进入议购议销。现在煤炭的统配部分只占50%，钢材只占60%，木材只占40%，水泥只占25%。这就是说，一方面，国家计委按计划分配物资来进行综合平衡，依然缺口很大；另一方面，如果加上议购议销部分，再加上进口大量的钢材、木材等，就能够保证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上升。我想这不能不是计划指标偏低、实绩较高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实际上已经存在两种价格（计划价格和议价），两个分配渠道（计划分配和议购议销）。因此，国家计划同实际执行结果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差距。在计划价格没有调整的情况下，紧缺生产资料（如煤炭）的议购议销，是促使生产迅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这种办法在目前是利多于弊。尽管会使我们在编制计划时留了物资缺口，但在实际执行中则留了一点余地，这余地就是来自议购议销部分的不断扩大。在生产资料的价格还没有大幅度调整或者虽已调价但尚未发生增产节用的经济效果以前，我认为两种价格、两个分配渠道还应当让它继续保持下去。堵是堵不得的，只能因势利导，承认生产资料在计划分配外还有市场调节。现在生产资料的供应仍然相当紧张，目前我们编制计划仍然不要急于提高计划速度，在执行中计划必然会被突破，突破部分靠议购议销来补充。近两年固定资产投资突破计划很多，由于生产资料的增长也较多地突破国家计划，1984年除钢材外，生产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和。所以，议购议销有所扩大的势头应当让

它继续保持下去。

由于沿海城市扩大开放范围，去年一年签订引进的外资超过过去几年的总和，今后几年投资的规模很难不突破国家计划。为着促进生产资料的增产和节约，我们必须迅速调整价格。但为了防止物价的普遍上升，生产资料的调价要分几次完成，每次调价的幅度较小。因此我们进行价格改革，只能“调放结合”，靠议购议销来促进生产、鼓励节约，以保证生产和建设的迫切需要。

既然承认议购议销，就必须承认生产资料也有市场调节。这就必须有计划地在各大中城市建立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以便于各地区、各企业在市场中互相交换。过去由于生产资料只能实行计划分配，不能实行市场调节，许多企业为着保障供应，都积存了大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钢材）。小仓库积压多了，物资部门的大仓库就少了，从而加剧了供应的不足。有些同志曾建议把企业的小仓库中积压的物资都调到物资部门的大仓库来，统一由物资部门来保障供应。但是，如果用计划价格来调拨，就根本行不通；如果用议价调拨，议价订在什么水平上也是一个难题。而且，如果物资部门不能保障供应，企业把库存积压物资拿出来是不放心的。比较行得通的办法，是建立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让各地区、各企业商议价格，自由交换。

从1979年起上海等地就试办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因议价往往比计划价格高出一倍甚至一倍以上，使有些交易市场处于半合法的地位，甚至有时还被禁止。其实，让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合法存在，而且予以扶持，兴建交易大楼，让许多地区和大企业租一间办公室，在市场中互相交换，并且定期开交易大会，让大楼外的企业也到市场上来交换，企业的积压物资就会流到市场中来，就有可能大大缓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供应缓和了，议价就会自然下落，煤炭的情况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好例子。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需要在计划分配（只对重点企业、重点产品）以外进行市场交换，这是目前解决生产资料供应紧张状况的一个有效办法。

当然，从长期来看，国家必须调整生产资料的价格，以鼓励增产节约。如果基本建设规模得到适当控制，调整价格又生效了，供应情况就

将缓和下来，议价也将自然降落。但在这一点还没有做到以前，必须实行“调放结合”，“放”就是准许议购议销，而且广泛建立生产资料的交易市场，进行市场调节。即使在调价完成以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还应当长期保持下去，物资分配部门可以参与生产资料交易市场，组织产需双方互相交换，在市场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

当计划外的固定资产投资统统纳入国家计划（包括指导性计划），计划分配外的物资交换也纳入国家计划以后，我们就有可能作出真正留有余地的全面的国家计划，从而消灭计划与实绩差距很大的不正常情况。估计在“七五”计划时期我们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能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当然，也可以考虑在现行计划以外再做一个估算性的计划，但它不能作为指令性计划。目前，当上述要求还做不到时，如果就按实际增长速度来制订国家计划，必将使物资供应的缺口无法弥补。

现在我们的建设规模已经偏大，生产增长速度并没有受到计划偏低的限制，看来今年将比 1984 年更高。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宁可走慢一点（实际上已很快），对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要控制得严一点，以免走得太快了摔跤。实际经济生活中积累和消费基金同时膨胀的势头已经远超过国家计划，宏观经济的控制不是太严而是太宽。放活要加快步伐，放活后如何加强管理（不是回到过去指令性计划的老路上去，而是利用经济手段来管），同样是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这几年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为什么愈来愈快，我同意大家谈的意见，是调整、改革和开放政策发生效果。这几年的高速度与三年“大跃进”截然不同，是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产品比较适销对路的情况下产生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已从严重失调逐渐恢复到正常情况，只要我们继续控制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就不会发生“折腾”，而且有可能发展得更快一点。近几年引进外资很多。同 1978 年突击引进外国设备也大不相同，主要是用于投资省、见效快的技术革新和中小企业的建设，多数企业在三年内就能够收回投资，时间长的也只有五年。只要领导机关做好规划协调工作，今后几年生产增长的速度可能更快一点。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由于我们在减少指令性计划后还没有

学会利用经济杠杆来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计委、财政部、中央银行都管得不够紧，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如果增长过快，就会再次出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紧张情况，这就将为调整价格增加困难，而这正是整个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去年一年货币发行增加过多，现在大家正在对这问题进行讨论。产生这种现象主要不是财政赤字，而是信贷膨胀。我们通过吸收存款和出售商品来回笼货币的工作，也跟不上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现在农民的手持现金多到无法估计，由于工业品不能大量下乡回笼这些现金，许多农民腰缠数千元，进城来“抢购”。银行是存款难、取款难，汇兑更难，不能充分吸收社会游资。商业是库存积压商品过多，农村商业网点太少（许多集镇的商店远远少于解放初期），不能利用积压物资来吸收社会游资。现在城市中商业渠道少、环节多的现象开始有些改进，但在农村中还没有树立依靠群众办商业的思想，有些供销社的同志还想用扩大自己的经营来包办农村商业。对商业改革的要求，我想除多渠道、少环节外，还要加上一个“周转快”。在商品供应紧张时期，我们用充实商品库存的办法来保障市场物价的稳定。现在商品（主要是消费品）供应多了，我们应当改变旧观念、旧办法，鼓励多销，加快商品周转速度。当前，许多库存积压商品应当减价推销，可以考虑广设减价商品展销市场，既可回笼大量货币，又可以压一压可能出现的涨价风。商品销售多了，货币回笼自然也就多了，市场货币流通量也会随之减少，这是既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又保障市场物价稳定而应采取的办法。

总之，一方面用扩大银行业务的办法来吸收社会游资，另一方面用推销库存积压商品的办法来吸收社会游资，再加上利用一部分外汇进口高档消费品来吸收社会游资（进口彩电等高档消费品应稳步前进，进口太多就会从提款抢购恢复到贮币待购，迫使我们不得不提早降价），三管齐下，使货币流通量大大减少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对目前货币发行数量过多的情况并不十分担心，我们可以用上述三种办法把它吸收回来。现在我们商品库存积压过多，外汇（包括库存资金）也多了一点，要打主动的进攻战（用上述三种办法来吸收社会游资），不要打消极的防御战（为怕抢购而充塞商品库存）。因此要加速进行金融、贸易、交

通运输等方面改革的步伐，以适应商品生产迅速发展的需要。

交通运输改革的关键也是变独家经营为多渠道经营，中央（交通部）、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1981年我曾路过长江，江面上船只很少，空荡荡的。一年多来长江成立了几十家运输公司，情况已有改变。去年在山东、福建，看到海上运输不如解放以前，渤海湾的运输也是如此（大连、烟台到天津的海上运输比铁路近得多了）。要交通部多买轮船来解决运输问题是不可能的，办法只有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交通部应当全面规划，大力帮助，解决地方、集体、个体难以解决的问题。

现在粮食、棉花等物资积压了大量的资金，赵紫阳同志提出对粮食、棉花要改变统购统销思想，提倡搞市场调节。最近听说无锡、芜湖等地开始恢复原来的米市，二十几个省市到无锡米市去进行余缺调剂，参加经营的主要是粮食局和供销社。因此我想，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应当迅速废止，只让农民背着一二百斤粮进城销售已经解决不了目前的问题。应当有批发经营，有议购议销的粮商。可以允许乡镇企业甚至私商参加粮食经营，由于运输工具掌握在我们手里，私商肯定不可能占据重要地位，是不会出大问题的。

我讲的问题太多了，原因是开一次会不容易，多提些问题请大家用新的目光来对新的形势进行分析。某些老的办法（如控制积累、消费基金）应当继续坚持，但单靠老的办法是不行了，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而采取许多新的办法，不要一遇到困难就总想回到老路上去。

关于物价的几个问题^{*}

(1985 年 1 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前后，社会上有一种谣传，说在把企业搞活以后物价就会上升，有的城市对少数几种商品在短时期内发生抢购，也有少数企业在扩大自主权后，不从改善经营管理，而从提高产品价格来增加盈利。因此，大家对物价是否能够稳定十分担心，怕因物价上升引起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我参加的几次讨论中，许多同志要我答复物价中的一些问题。看来有这类疑问的同志是相当多的，所以我根据自己的认识，对这些问题作一次简要的答复。

一、各类商品的价格为什么要不断调整

稳定物价是我们的一贯方针。但是过去往往只宣传稳定物价，而不宣传各类商品的价格需要不断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把稳定物价同冻结物价等同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政府因怕市场混乱，下令把物价冻结了十年。在这十年中间，各类商品的成本不断变动，如农产品、矿产品因受自然条件限制，产量增加而成本不易下降，甚至随之上升，这些产品原来的价格就低于价值（生产成本 + 平均利润），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就不愿意增加生产。虽然我们的国家计划要求优先发展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发展很慢，粮食、棉花等人民迫切需要的许多种消费品供不应求，只能从国外大量进口，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煤炭、石油等是国家计划必保的产品，但因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价格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生产上不去，消耗降不下来。煤炭和好多

^{*} 本文原载 1985 年 1 月 28 日《人民日报》。

种原料靠国家的补贴来维持生产，靠统购、统配来解决供应问题。事实上保证不了供应，不得不允许企业用议购、议销的办法来作补充。另一方面，有许多种加工工业产品生产发展，成本下降很快。国家要靠它们上缴盈利，来弥补亏损产品的补贴，不准这些产品降价。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由于产品价高利大，盲目发展，生产积压；而且由于价格过高，不能用薄利多销的办法推销这些积压产品，因此有些很需要的产品不得不被迫减产。这样就把生产搞死了，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无法满足。

解脱这种困境的根本办法是调整价格。第一个成功的例子是 1979 年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业生产迅速上升。近几年农业生产猛烈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提高价格，体制改革是更重要的原因。但如果光有体制改革，不提高价格，农民发展生产后得不到经济利益，他们也是不会有这样大的积极性的。三四年前我们还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棉花、油、糖等，现在粮棉完全可以自给，甚至需要从征购变为合同收购，多余部分让农民自己销售。1979 年以前猪肉、鸡蛋等供应一直很紧张，1979 年一提价，生产迅速上升，很快就增加了供应。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调整棉布和化纤布的价格。50 年代我国棉纺织业利润是很高的，发展很快，但因人民生活改善，需要增加更快，不得限量供应。到 60 年代、70 年代，由于棉花几次提价（三十年内棉花提价 2~3 倍），棉纺工业转盈为亏，要靠国家财政补贴来维持生产。与此同时，化纤织品大量发展，成本迅速下降。国家要用化纤布的盈利来弥补棉布的亏损，不准化纤布降价。化纤布不能降价以扩大销路，以致大量积压，国家计划就限制甚至压缩化纤布的生产，使整个纺织工业陷入困境。1983 年国家下决心提高棉布的价格，同时大幅度降低化纤布的价格。化纤布的销路大增，从限制生产变为放手发展生产。化纤布销路扩大了，棉布的供应就不紧张。实行了三十年的凭布票限量供应制度也随之取消了。纺织品价格的有升有降的调整，总的来说物价并没有因此上涨，人民也没有增加开支，但把整个纺织工业搞活了，市场也搞活了，不但充分满足了人民对衣料的需要，而且使穿的衣服丰富多彩，人民的生活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

各类商品情况不同，在生产发展中成本的变化是很大的，不及时调整价格，就不能保证各类商品按照成本变化和市场需要顺利发展，因此也就不能使人民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改善。有些同志害怕物价的调整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提出可不可以不调整物价，因成本下降而价高利大的产品把多得的盈利统统上缴给国家，用来补贴因成本上升而价低利小甚至亏损的产品？这是吃“大锅饭”的办法，三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吃的苦头已经太多了，决不能再保持下去。我国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都广泛地进行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商品交换就必须承认等价交换的原则，否则各企业就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谓等价交换，就是说必须按符合于价值的价格互相交换，成本（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变化了，价格就必须随之变化。产品的价格不但必须反映价值，而且必须反映供求关系。从原则上来说，供不应求的产品价格可以略高一点，供过于求的产品价格可以略低一点。价格偏高的产品生产会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价格就会回落。价格偏低的产品生产会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价格就会回升。所以从长期看，反映价值和反映供求关系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在短时期内，某些商品如果供求突然变化，有可能使价格在一定幅度内背离价值。这种背离是有好处的，它使生产按照市场需要自行调整。

二、为什么说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 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过去的计划管理制度下，工厂按计划生产，商业部门按计划收购和分配，许多产品的生产不符合市场需要，许多种产品因价低利小，供不应求。生产单位和建设单位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满足不了需要，就停工待料，采购人员满天飞；人民所需要的消费品供不应求，重要消费品就限量供应，次要消费品就让它长期脱销。另有许多种产品因价高利大，供过于求，长期在仓库中积压，也不允许生产和销货部门降低价格，打开销路，像化纤布那样宁愿减产，也不降价。这样的计划管理体制，显然是对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十分不利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为把经济搞活，要给企业以充分的自主权，使它们能够自主生产，自负盈亏。为此要减少指令性的计划，增加指导性的计划。该决定指出，指导性计划必须利用经济杠杆特别是价格政策来指导企业的生产发展方向，使它符合国家计划和市场需要。如果不调整价格，价高利大的产品就会更加盲目发展，价低利小特别是亏损的产品就更有可能生产萎缩，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此，调整价格体系目前已经成为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当务之急。有些同志担心放手调整价格会把国民经济搞乱，其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调整价格，企业就“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样就把经济搞乱了。只有调整价格体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做到活而不乱。农业生产扩权是扩得最彻底的，但我们依靠调整价格，不但把生产搞上去了，而且各类农产品的比例关系，也可以利用价格政策来进行调整，使它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近几年有几种产品曾经盲目发展，挤占粮田，那不是由于扩权，而是由于超售奖励过多。一压缩奖售加价（实际上是降低价格），问题就很快解决了。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如果不调整棉布和化纤布的价格，纺织工业不是管死，就是放乱，合理调整价格，问题就顺利解决。

在把企业放活以后，它们就要互相竞争，就要比赛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只能主要用盈利来衡量。但因价格不合理，许多企业盈利多是由于产品价格过高，或者所用原材料价格过低；许多企业盈利少是由于产品价格过低，或者用议价的原材料。像赛跑一样，必须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用不合理的价格是无法衡量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所以在实行企业承包定额利润、超额分成以后，由于价格偏高偏低，就发生各行业、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现象。先进企业承包定额较高，所以常常“鞭打快牛”。今年起实行利改税，想用产品税来缓解物价不合理所造成的矛盾。但产品税只能分类制定税率，在同一类产品中，有些产品价格偏高，有些产品价格偏低，不可能都用增减税率来解决。因此随着利改税的推行，大家将会愈来愈感到调整价格势在必行，认识到这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益，从而督促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

近几年有愈来愈多的国外经济学家称赞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同时又说能否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资本主义经济是靠价值规律来调节，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要利用价值规律。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就必须遵守价值规律。所以不论从理论上讲，或者从实际需要来讲，不调整价格就不能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现在我们深深感到生产发展了，流通渠道过分狭窄，以致卖难买难，必须迅速扩大市场。为此也有必要利用价值规律，迅速调整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

当然，目前由于价格背离价值过大，如果一下子全面调整，对生产和生活都会产生相当大的震动，因此调整价格必须慎重规划，有步骤地逐步进行。但畏缩不前也不行，如果再不调整，价格 and 价值的背离将愈来愈大，将来调整就更困难了。现在主动地有计划地逐步调整价格，如果某些重要消费品需要提一点价，就相应地提高工资，完全可以保证人民生活不但不致下降，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继续有所改善。

三、物价会不会普遍上升，在调整价格时能不能不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形态，价格一方面决定于各类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决定于货币所代表的价值。物价普遍上升，实际上是货币贬值，是通货膨胀所产生的结果。没有通货膨胀，物价总是有升有降，不会普遍上升的。在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要量不变的条件下，货币发行增加一倍，物价也会上升一倍。如果在这时期商品流通量增加一倍，那么即使货币流通数量增加一倍，物价也不会上升。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物价的猛烈上升，主要是当时为保证战争供应，货币发行数量急剧增长所产生的结果。1950年3月战争胜利结束，财政收支平衡，国家有可能控制甚至紧缩货币流通数量，物价就突然稳定了。60年代初期物价波动，是由于三年“大跃进”，生产下降，货币发行增多。经过五年调整，生产回升，货币流通数量减少，到1964年、1965年物价就稳定而